

# 胡人與漢人

## ——「異人買寶譚」與漢人認識之變遷

妹尾達彥\*

### 摘要

本報告分析「異人買寶譚」的誕生、變遷與世界認識的變遷之關係。異人買寶譚屬於異人來訪並識別發現被埋沒的寶物並予以購買之情節類型的民間故事。本報告首先在第一節中，廣泛收集大量記錄該故事的唐代之事例，分列為一覽表，整理出故事結構中固定的類型。接著在第二節中，選取故事中可變性因素，探討唐代的異人買寶譚之特徵，指出八、九世紀以後，越來越多來到中國城市的外國商人之活動構成了唐代異人買寶譚流傳的重要背景。

最後在第三節中，基於中國大陸中的世界認識變遷之模式，嘗試分析通過異人買寶譚對來到中國大陸的中國大陸外部的人們賦予「回回」、「洋人」等異人之名稱，創作並流傳非漢人探尋漢人社會內部的寶物這一故事，而在居住於中國大陸的人們之間逐步形成「漢人」這一同類意識的過程。具有敘述眾神世界與人間之間的交流這一神話性、宇宙論性結構的異人買寶譚的情節類型，因中國大陸的內外情勢之變化與世界認識之變遷而轉變為通過強調共同體外部之存在，來樹立共同體內部的同類意識的情節類型，成為促使自我意識到漢人社會之存在，強化其紐帶地以人間為中心的民間故事。

**關鍵詞：**異人買寶譚、世界認識、漢人意識、異人、胡人

---

\* 作者係日本中央大學文學部教授。

## 一、序言：近代中國民間故事研究之開端 與「異人買寶譚」之發現

近代中國對於民間故事的收集與分類是受到西歐的民間故事研究之影響，在十九世紀 20 年代以沿海地區的城市為中心正式起步的。北京大學的《歌謠》（1922-1925）與中山大學的《民間文藝週刊》（1927 年創刊。1928 年以後改稱《民俗》，直到 1933 年）、浙江省紹興的茶商陶茂康與中國民俗學會鍾敬文等編輯的《民間月刊》（1931-1933）等雜誌出版後，民間故事研究在中國也正式開始。

在形成近代國家之際，由各國的具有代表性的知識分子收集了該國的民間故事與民謠。中國的顧頡剛（1893-1981）、周作人（1885-1967）、鍾敬文（1905-2001）、德國的格林兄弟（Brüder Grimm）、日本的柳田國男（1875-1962）、折口信夫（1887-1953）等對於民謠的收集與分析即為其例。

在本報告中分析的「異人買寶譚」，屬於異人來訪並識別發現被埋沒的寶物並購買之情節類型的民間故事，由於大量登載在上述《民間月刊》中而作為一個情節類型而廣為人知。同時，在中華民國的知識分子從民間收集作為口頭傳說的異人買寶譚之同一時期，日本的石田幹之助（1891-1974）從遺留下來的古代文獻中首次廣泛收集異人買寶譚型的情節類型，進行了分類。

十九世紀 20 年代，東洋史學者石田幹之助在殘存的唐代說話中，發現了一系列同類型的故事，將這些說話命名為「胡人買寶譚」或「胡人采寶譚」，在柳田國男主編的雜誌《民族》4.1（1928）上發表了各故事的抄譯。<sup>1</sup>這構成了至本報告為止的 90 年間分析中國的異人買寶譚之開端。

石田幹之助持續一生收集這些命名為「胡人買寶譚」的情節類型的故事，並注意到該情節類型不僅存在於唐代，還存在於六朝時代及宋代、中華民國時期，在空間上也不限於中國大陸，還流傳到朝鮮半島與日本列島。<sup>2</sup>

1 石田幹之助，〈西域の商胡、重價をもって寶物を求める話——唐代シナに公佈せる一種の說話について〉，《民族》4.1(1928): 85-124，其後收入同作者著《長安の春》（增訂）（東京：平凡社，1967），頁 210-246。

2 石田幹之助，〈再び胡人採寶譚に就いて〉，《民俗學》5.10(1933): 1-14，其後收入《長安の春》（增訂），頁 247-260；同作者著〈胡人買寶譚補遺〉，《日本大學文學部研究年報》6(1955): 67-84，其後收入《長安の春》（增訂），頁 261-281。

這些說話中呈現出的普遍性結構如下：

首先，某人（漢人）獲得寶物，表面上看不出有甚麼價值，故不知其為寶物。其後，因某一機緣，來到中國的胡（西域人）商，識破其真正的價值，經過交涉，以極為昂貴的價格將其買走。

石田傾力於蒐集並介紹這些故事，對於分析其意義則相當謹慎，其後由民俗學家澤田瑞穗從民俗學的觀點予以嶄新的分析。<sup>3</sup> 弄清楚該故事超越了石田幹之助所收集的時空，在明清時代的書籍與中華民國時期的民間故事中也大量存在，其中，發現寶物者與購買者不僅有來自西域的胡商，還包括南蠻人、回教徒商人（回回）、高麗以及倭國的使臣、中國國內的江西人，乃至西歐人。於是，在澤田公開發表研究成果後，該故事不是被稱為「胡人買寶譚」，而是被更一般性地稱為「異人買寶譚」。

即，該情節類型的特徵在於非侷限於特定的時代與地域，而是廣泛地分佈在東亞時空中，具有多種敘述方式，但基本上由下述三個要素構成。總而言之，這是一個有關來自外部的異人與內部的寶物之移動，而使得共同體的內部與外部之間產生互動的故事。

- （一）存在作為寶物的東西。
- （二）由來自外部的異人探知與鑑別寶物。
- （三）由異人將寶物帶到外部。

澤田論述到，自古流傳在中國各地的，發掘被埋藏的寶物而致富的「掘藏致富譚」之廣泛存在與將來自外部的異人作為探知寶物者的「異人買寶譚」銜接起來，導致該故事廣泛流傳。<sup>4</sup> 澤田推測，進入隋唐時代，以胡商為主角的異人買寶譚之所以流行的原因，與在隋唐來自西域的外國商人頻繁往來有關。<sup>5</sup>

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山田勝芳詳細論述了在該故事中外國商人（胡商）

---

3 澤田瑞穗，〈金牛の鎖〉，《天理大學學報》7.9(1972): 1-16；〈異人買寶譚私鈔〉，《早稻田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紀要》26(1981): 133-155，其後皆收入同作者著，《金牛の鎖——中國財寶譚》（東京：平凡社，1983）。

4 澤田瑞穗，同註3《金牛の鎖》，頁98，以及〈寶精篇〉、〈寶精零篇〉（皆收入《金牛の鎖》）；劉勇強〈掘藏——民俗から小説へ〉，《中國——社會と文化》11(1996): 197-223，東京：中國社會文化學會，1996），基於澤田的研究，詳細論述了掘藏致富譚的變遷。

5 澤田瑞穗，同註3《金牛の鎖》，頁145。

的出身與進行寶物交易時所使用的貨幣種類部分是與中國社會經濟史的變化敏銳地相對應而變化的。<sup>6</sup>

為異人買寶譚研究開闢了新時代的研究者是受到鍾敬文薰陶的程蕃。程蕃提交博士論文予執教於北京師範大學的鍾敬文，便以《中國識寶傳說研究》（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為名出版，其中概括了以往異人買寶譚之研究成果。

《中國識寶傳說研究》由 1.識寶傳說的形成、2.西域胡人識寶傳說、3.回回識寶、江西人覓寶及南蠻子慙寶傳說、4.洋人盜寶傳說、5.民間識寶傳說的影響、6.餘論構成，將被埋沒的寶物因異人而得到識別這一民間故事命名為「識寶傳說」，將異人買寶譚作為識寶傳說的一種特殊類型，系統性地分析了識寶傳說的變遷。程蕃提出的因時代的變遷，異人的角色逐步從西域胡人變為伊斯蘭商人回回、西歐人這一結論與上述澤田瑞穂、山田勝芳的分析不約而同。可是，在《中國識寶傳說研究》中提出了未曾見到的豐富資料，進行了詳細而精緻的分析，在目前可謂最傑出的研究成果。其後程蕃也在《驪龍之珠的誘惑》（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與「寶物故事：一類民間文學主題的探索」（名古屋大學 2004 年 11 月 19 日講演）中進一步予以考察。

並且，異人買寶譚被作為了解唐代西域商人的商業活動之實態，以及唐朝如何對待外國人的佳例，由葉德祿、<sup>7</sup>中田薰、<sup>8</sup>Edward H. Schafer、<sup>9</sup>日野開三郎、<sup>10</sup>謝海平<sup>11</sup>等從商業史、法制史、社會史的角度進行了分析，它構成了唐代史研究中的傳統主題之一。

筆者從城市史研究的角度出發，頗為關心以唐代的城市為舞臺的小說與

6 山田勝芳，〈胡人採寶譚をめぐって——中國と日本における異邦人商人と貨幣〉，收錄於高橋富雄編，《文化における受容と變容》（東京：角川書店，1985），頁 155-177。

7 葉得祿，〈唐代胡商與珠寶〉，《輔仁學誌》15.1、2(1947): 93-118。

8 中田薰，〈唐代法に於ける外國人の地位〉，收入《法制史論集》卷 3 下（東京：岩波書店，1943），頁 1361-1392。

9 Edward H. Schafer, "Iranian Merchants in T'ang Dynasty Tales," *Semitic Philology*, Vol. X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 1951), pp. 403-422.

10 日野開三郎，〈唐代的波斯錢について〉，收入《石田博士頌壽記念東洋史論叢》（1965），頁 367-381，其後收入《日野開三郎東洋史學論集》第 5 卷（東京：三一書房，1982），頁 231-243。

11 謝海平，《唐代留華外國人生活考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

說話，並嘗試對若干故事進行了分析。<sup>12</sup>在本文中，基於上述研究，從中國城市史研究的角度出發，關注唐代的異人買寶譚，特別是將其作為反映了漢人對待城市中的外國商人之心情的故事，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加以探討。

通過以上研究的介紹，基本上弄清了異人買寶譚的變遷本身，因此在本報告中嘗試結合漢人的世界認識之變遷，來分析該變遷的歷史意義。如預先說出結論的話，就是異人買寶譚之流傳對於居住於中國大陸的人們確立「漢人」這一同類意識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認為「漢人」這一同類意識之形成及其變遷在異人買寶譚的情節類型與結構性要素之變遷中得到了反映。

即，在本報告中希望指出，具有敘述衆神世界與人間之間的交流這一神話性、宇宙論性結構的異人買寶譚的情節類型，因中國大陸的內外情勢之變化與世界認識之變遷而轉變為通過強調共同體外部之存在，來樹立共同體內部的同類意識的情節類型，成為促使自我意識到漢人社會之存在，強化其紐帶地以人間為中心的民間故事。

本報告首先在第一節中，廣泛收集首次大量記錄該故事的唐代之事例，分列為一覽表，整理出故事結構中固定的類型。接著在第二節中，選取故事中可變性因素，探討唐代的異人買寶譚之特徵，指出八、九世紀以後，越來越多來到中國城市的外國商人之活動構成了唐代異人買寶譚流傳的重要背景。最後在第三節中，基於中國大陸中的世界認識變遷之模式，嘗試分析通過異人買寶譚對來到中國大陸的中國大陸外部的人們賦予「胡人」、「回回」、「洋人」等異人之名稱，創作並流傳非漢人探尋漢人社會內部的寶物這一故事，而在居住於中國大陸的人們之間逐步形成「漢人」這一同類意識的過程。

## 二、唐代異人買寶譚之結構

唐代異人買寶譚之特色在於它是來自中國西方的胡人的買寶譚。根據故

---

12 妹尾達彦，〈唐代後半期の長安と傳奇小説——《李娃傳》の分析を中心として〉，《日野開三郎博士頌壽記念論集》（北京：中國書店，1987），頁 476-505。妹尾達彦，〈唐代長安の店舗立地と街西の致富譚〉，《布目潮風博士古稀記念論集》（東京：汲古書院，1990），頁 191-243。以及，關於胡人買寶譚，在妹尾達彦，〈胡人買寶譚贅說〉，收入《日野開三郎東洋史學論集》第 14 卷〈編集のしおり〉（東京：三一書房，1988），（附冊）頁 1-6，其中曾極簡單地提到。

事梗概之發展整理其結構，大致可分為如下四個類型。<sup>13</sup>

### （一）交換成立型

第一，常被作為標準類型的是兼具上述三項結構性要素的情節類型。即 1.獲得寶物——漢人得到作為寶物的東西、2.鑑別寶物——來自外部的胡人了解該寶物的真價，探知並鑑別、3.買賣寶物——胡人高價買下寶物帶到外部世界，這樣的三段落結構。<sup>14</sup>這可謂在胡人與漢人互相認可的前提下，寶物的交換得以成立的「交換成立型」。

### （二）交換未成立型

第二，相對於該交換成立型，還存在少數事例在上述 3.買賣寶物的段落中寶物的交換未能實現的「交換未成立型」。這是儘管胡人曾從漢人手中購得寶物，但在將要帶走時，其真正價值洩露而被取回，或想購買寶物，卻由於發生了障礙而交涉未能成立的故事。胡人不是通過購買而盜取寶物的故事，在未經互相認可的交易這一點上，也可歸入該交換未成立型。

### （三）僅有探知、鑑別寶物的情節類型

第三，還存在一些故事止於上述 2.鑑別寶物的段落，沒有 3.買賣寶物這一段落。此時，由於沒有購買寶物的行為，準確地說，不屬於「異人買寶譚」，而應稱為「異人識寶譚」，由於很多故事有可能是遺漏了買賣部分，故分入此類型。<sup>15</sup>

不過，在各個時代，異人買寶譚的情節類型之核心為 2.敘述異人鑑別珍寶的部分，描寫外國商人不可思議的鑑別能力的部分確實常常獨立流傳。後來，作為體現外國商人鑑別珍寶能力之強的詞彙，有「波斯眼」的說法，<sup>16</sup>在

13 石田幹之助，同註 1《長安の春》（增訂），頁 210-211 中提到胡人買寶譚的各故事間的細微差別，但未對故事情節梗概進行分類。

14 該標準型中也有各種特殊類型。例如在（二）中有不是在城市買賣，而是由胡人找到城市郊外的寶物所有者之事例（表 8、12），還有雖是胡人，但不是外國商人之事例（表 12、20）等。

15 石田幹之助，同註 1《長安の春》（增訂），頁 211。

16 《漢語大詞典》第 5 卷，「波斯眼」條目（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0），頁 1119。

漢語中稱異人買寶譚為「蠻子眼毒」<sup>17</sup>或「別寶回子」<sup>18</sup>都體現了該故事之核心在於探知、鑑別寶物部分中。

#### (四) 買賣、轉讓病死的胡人之寶物的情節類型

第四，將受病死的胡人委託寄存的寶物，其後出售或轉讓給來訪的胡人之姻親的故事。該病死的胡人其寶物之事，在寶物經由漢人之手被轉到胡人手中這一點上，與第一類型相似，但在開頭部分，從死亡的胡人手中接受寶物這一點不同，在此作為獨立的類型分類。

文末附表「唐代異人買寶譚一覽」便是將唐代的異人買寶譚按上述四個結構類型，按：（一）標準的交換成立型（表中編號 1-21）、（二）交換未成立型（表中編號 22-26）、（三）僅有探知、鑑別寶物的情節類型（表中編號 27-31）、（四）賣買、轉讓病死的胡人之寶物的情節類型（表中編號 32-36）的順序進行分類，歸納為一覽表。

在此，從（一）交換成立型中選出一個短故事，按上述三個段落區分子以介紹。<sup>19</sup>該史料是選自表中編號 4 的《太平廣記》卷 402，寶部，嚴生，頁 3242-3243（出自《宣室記》）的故事。

馮翊嚴生者，家於漢南，嘗遊峴山，得一物。其狀若彈丸，色黑而大有光，視之潔徹，若輕冰焉。生持以示於人，或曰珠也。生因以彈珠名之，常置於箱中。其後生遊長安，乃於春明門逢一胡人，叩焉而言，衣囊中有奇寶，願有得一見。生即以彈珠示之。胡人捧之而喜曰。此天下之奇貨也，願以三十萬為價。曰此寶安所用，而君厚其價如是哉。胡人曰我西國人，此乃吾國之至寶。國人謂之清水珠。若置於濁水，冷然洞徹矣。自亡此寶且三歲，吾國之井泉盡濁。國人俱病。故此越海踰山，來中夏以求之。今果得於子矣。胡人即命注濁水於缶、以珠投之，俄而其水澹然清瑩，纖毫可辨。生於是與珠與胡。獲其價而去。

正如粗體字部分明確地體現的那樣，胡人之國的寶物丟失後相當困頓，為探

17 永尾龍造，《支那民俗誌》第 2 卷（東京：支那民俗誌刊行會，1941），頁 40。山田勝芳，同註 6 論文，頁 171-172。

18 朱江，《海上絲綢之路的著名港口——揚州》（北京：海洋出版社，1986），頁 67。

19 該故事在石田幹之助，同註 1《長安の春》（增訂），頁 225-226 中有譯文，作品編號 10，故也參考了石田幹之助譯文而譯出。

求而來訪的彼地人們，好不容易才發現了埋沒在漢人社會中的寶物而買去，此外這一故事還有若干相同類型者（表中編號 1-6）。

此時，存在於中國的本國寶物種類，除如上列舉的化濁水為清水的西國至寶「清水珠」外，還包括古代被盜到中國的大食國國寶「陽燧珠」（表中編號 1）、大食國向中國納貢的「水珠」（表中編號 2）、為本國鎮災的罽賓國的舊寶「鎮國碗」（表中編號 3）、在本國的海邊可採集珍珠「寶母」（表中編號 5），以及為本國太子療病的藥（表中編號 6）等。

正如針對具有為本國鎮災效應的罽賓國之舊寶，寫明了「此罽賓國碗，其國以鎮災厲。唐人得之，固無可用。（中略）且非中國之寶」（表中編號 3）那樣，這些寶物被認為是對於胡人社會而言，比對中國更為重要者。並提到，在中國其本來的效應未被利用而被埋沒，而且在西域本國，如果缺乏這些寶物，生活上會發生種種困難。

就是說，可以認為該故事的重點在於漢人社會通過將埋沒在自己一方世界中的東西賣給認其為寶的胡人，而「款待」了胡人這一點上。值得注意的是，胡人高額購入寶物意味著胡人對漢人的答謝，漢人與胡人成交，但如上述事例所示，胡人得到了無價之寶，所以並非構成等價交換。

町與村等共同體接納商人與旅客等異邦人，設宴、提供住宿、款待等，作為自古以來在世界各地廣泛存在的「款待異邦人」的習俗而為人所知。<sup>20</sup> 上述故事可理解為，正是以說話的形式描述了這一款待異邦人的習俗。

即，該故事的意義所在如更加普遍化的話，便是在於共同體內部的廉價物品得以轉換價值，成為「可贈予」共同體外部之人的寶物這一點上，他們通過購入在共同體內部看似不值一錢，但因向外部出售而被成為貴重寶物的東西，而受到共同體的款待。胡人從中國人手中購買在中國被埋沒的本國之寶物的上述諸例可視為其典型。

胡人的身分為受大食國王敕命的使者（表中編號 1），或本國的大富豪（表中編號 32），或出身於貴族世家者（表中編號 33）等，穿越萬里波濤，來到中國，花費漫長歲月探訪本國寶物（表中編號 1、2、3、4、5、32、33），這顯示了胡人買寶譚具有與貴重流離譚相重疊的一面。一般而言，貴重

20 小松和彥，《異人論——民俗社會の心性》（東京：青土社，1985），頁 11-14。H. C. Peyer 著，岩井隆夫譯，〈ヨーロッパ中世における商人の款待（Kaufmannsgastlichkeit im europäischen Mittelalter）〉，《比較都市史研究》6.1(1987): 13。

流離譚的主人公，在遭遇到種種危難之同時，在流浪的土地上也受到款待。<sup>21</sup>

並且，在除上述以外的典型的交換成立型的故事中，也通過胡人識別出漢人不太識其價值的物品是寶物而樂於購買這一情節，同樣可以認為其中包含著款待異邦人的要素（表中編號 7-21）。然而同時，也可以感到在故事中混淆著至今未注意到的共同體之寶物被外來的異人發現，盜竊這一與款待相反的否定性感情。存在交換未成立的故事則證實了這一點。

歸納於（二）交換未成立型的故事有 5 例。其中 3 例是胡人在中國購買了探求到的本國寶物，但在攜回本國之前，被發現了該價值的中國皇帝或海神奪取了寶物的故事（表中編號 22、23、25）。以及胡人在市場上發現月宮（月中宮殿）仙女的珍寶，出高價購買時，賣方因得知真價而不肯出售，故與硬要購買的胡人打起架來，並由官府介入的故事也屬於同一情節類型（表中編號 24）。

這些無論本來是胡人之國的寶物還是中國產的寶物，中國社會都不容忍由胡人將存在於中國的寶物帶到國外之例，可以認為與上述款待胡人相互對立的感情正構成了該故事的基礎。<sup>22</sup>

並且還有胡商發現了漢人額頭的瘤中之珠寶，趁其泥醉之際取出，結果漢人的精力衰竭，終於病死，至今相當興旺的家運也因此喪失的故事（表中編號 26）。這個故事說明，外來者盜竊了該地之寶，使該地的運勢衰退，與後世被稱為「南蠻子盜寶」的異人盜寶譚屬於同一類型。<sup>23</sup>該故事比先交到胡人手中的寶物，其後再討回的上述故事更進一步，很明顯是將胡人視為盜寶之人的故事，其中混雜著於胡人的恐懼與敵意之感情。

唐代的胡人盜寶譚，目前只見到上述一例，在收集了四世紀左右的故事的《異苑》（卷 2，〈洗石孕金〉）中有被胡人探知寶物的主人察覺到寶物之

21 關於貴種流離譚與款待異邦人的關係，參閱折口信夫，〈國文學の發生〉，《折口信夫全集》（東京：中央公論社，1954）第 1 卷。

22 本不是胡人本國的寶物，而是由胡人發現中國產的寶物之價值並購買時（表中編號 11-15），對中國人而言，在心理上既存在中國產的寶物由胡人恰當地給予較高評價的一面，也有珍貴的中國寶物竟被胡人買走的一面，這在故事中微妙地錯綜糾纏在一起。本文中所以舉出的拒絕將月宮仙女的寶物賣給胡人的故事（表中編號 23）可謂是以後者的心理為背景的。

23 澤田瑞穗前引註 3、山田勝芳，前引註 6 著作之外，還有山本斌，《中國の民間傳承》（東京：太平出版社，1975），頁 180-214。

存在，在落入胡人之手前，自己獲得了寶物的故事。在此，在記錄了胡人的識寶能力之同時，也可以窺視出視其為盜寶人的心情，可認為屬於盜寶譚之特殊類型。這樣的話，大約可以推測，類似的故事在唐代也曾廣泛流傳。

下面舉一個（四）賣買、轉讓病死的胡人之寶物的情節類型，即接受病死的胡人之寶物，然後將其出售或轉讓給胡人姻親的故事：<sup>24</sup>

崔樞應進士，客居汴半歲，海賈同止。其人得疾既篤，謂崔曰，荷君見願，不以外夷見忽。今疾勢不起。番人重土殞脫歿，君能終始之否。崔許之曰，某有一珠，價萬緡，得之能踏火赴水，實至寶也。敢以奉君。崔受之曰，吾一進士，巡州邑以自給，奈何忽蓄異寶。伺無人，置於柩中，瘞於阡陌。後一年，崔遊丐亳州，聞番人有自南來尋故夫，並勸珠所在，陳於公府，且言珠必崔秀才所有也，乃於亳來追捕。崔曰儻穿不為盜所殺，珠必無他。遂剖棺得其珠。沛帥王彥謨奇其節，欲命為幕，崔不肯。明年登第，竟主文柄，有清名（表中編號 34，《唐語林》卷 1，中華書局校證本，頁 21-22）。

由於該故事內容以寶物為媒介，體現了漢人與胡人的交流，所以基本上可以認為是率先提出款待異人的特殊類型。<sup>25</sup>不過，在該故事中，沒有蔑視胡人構成了獲得寶物的理由，並且日後來訪的病死的胡人姻親懷疑當初是不是被漢人奪取了寶物。在這些地方，胡人與漢人的對立感情普遍存在，暗示著兩者總是處於緊張關係之中。可以說，圍繞病死胡人之寶物的一系列情節類型，是以漢人對於胡人的複雜感情為背景的。

如此整理唐代的異人買寶譚，可以發現體現了款待異邦人的故事與相反體現了對異人的畏懼與敵視的故事交錯在一起。即在唐代也可證實，居住在

24 該故事未收入石田幹之助，前註《長安の春》（增訂）中。設定為主人公的崔樞，元和五年（810）為禮部侍郎。參閱《登科記考》卷 18。

25 不過，關注擁有財寶的異人死亡這一特異之處，與傳到日本的類似故事相比較的話，也可能存在不同的解釋。在關於擁有財寶的異人死亡的日本其類似故事中存在殺害異人後變為款待異人譚之事例。即有學者指出，村里人殺害了來到村里的外來者後，在變為傳說時，變為村人照看生病的外來者，照料後外來者死亡，並且死亡的外來者的姻親日後來到村子，答謝村里人照料病人這一異人款待譚之例，桂井和雄，〈遍路や六部などの持ち金を盗んだ家筋の話〉，《季刊民話》7(1976): 241-249。小松和彥，同前註 20《異人論》，頁 47、51。唐代的這一系列有關病死胡人的寶物之故事也許是殺害異人之事實故事化之際，轉為異人款待譚之事例。大約異人款待譚與殺害異人譚構成了有關異人之故事的不可分的互為表裏部分。

異邦人來訪地區的人，對於異邦人擁有的畏怖之念，以及充滿善意與敵意的矛盾情感。可以說互為表裡，相互衝突的這類感情之環流產生了創作並流傳異人買寶譚的能量，構成了再生產超越時空的固定的情節類型之源泉。那麼，唐代所固有的異人買寶譚之特徵在於何處？這一點將在下一節中論述。

### 三、異人買寶譚的變遷

異人買寶譚的要素中可變的部分，正如上表中縱列的各項目那樣，為(一)設定的時代；(二)寶物的持有者與購買者的種族、身分、姓名；(三)寶物的所在地與購買地；(四)寶物的外表與真正價值、買賣價格；(五)故事的出處（敘述者、記錄者、收集地等），這些項目是對應於時間與空間、社會狀況的變化而改變的部分。因而，通過與別的時代比較該可變部分的特徵，應該可以勾畫出唐代關於該故事的特徵。首先，按順序列舉從表中見出的特徵，並據此來論述唐代的異人買寶譚的時代特徵。

#### (一) 設定的時代

看明確記載之例，或據登場人物等可推測之例，可知故事設定的時代是從七世紀末的武則天（624-705, 685-705 在位）治世以後至九世紀末的唐末。特別是開元、天寶年間（八世紀前半）以後佔絕大部分。

#### (二) 寶物的持有者與購買人的種族、身分、姓名

寶物原來的持有者，可以認為幾乎都是唐代的漢人，<sup>26</sup> 身分幾乎都是官僚、科舉應考生、僧侶等，屬於知識階層，例外者也包括守船人、樵夫、旅館老闆。而另一方，寶物的購買者，正如石田幹之助命名為胡人買寶譚那樣，都是胡人。胡人泛指外國人，但在唐代較多是特指西域的外國人。<sup>27</sup> 以寫明胡人之出身的故事內容來看，他們為波斯人（7例）、大食國人（2例）、南越人（1例）、西國人（3例），尤其是波斯人居多。波斯語在伊朗系的波斯薩珊王朝於七世紀中葉被伊斯蘭勢力消滅後仍繼續使用，波斯與大食經常被混

26 還有一例少數民族的莫徭向胡人出售寶物的事例（表中編號23）。

27 石田幹之助，同註1《長安の春》（增訂）中收入的〈《胡旋舞》小考〉，頁27；謝海平，同註11，頁2-7。

淆。<sup>28</sup>即可以認為，唐代的異人買寶譚中的胡人主要是指伊朗系統和阿拉伯系統的商人。<sup>29</sup>胡人的職業中雖也有僧侶（2例）與將軍（1例），但幾乎皆為商人。

### （三）寶物的所在地與購買地

寶物原來的所在地較多為城市周邊的山中與河岸（14例），還包括城市中的寺院（5例）、橋（2例）、人家（2例）、城市居民的體內（5例）等。而另一方面，胡人探知、獲得寶物的地點除了一例為農村外，其他都在城市的城內。而且幾乎都在大城市的市場、城門附近與寺院中，城市名為長安（12例）、揚州（6例）、洪州（5例）居多，洛陽、荊州、廣州、常州、東州各為1例。將這些城市置於地圖上來看的話，可以發現正如「唐代異人買寶譚的城市分佈圖」那樣，它們存在於連接長安與南海的商業路線上（參看圖一）。

與在中華民國時期故事中的買賣、交易場所廣泛地分佈於農村不同，在唐代，大城市構成舞臺，這大約與當時胡人進入與活動之場所侷限於城市有關。在唐代的故事中，如上所述，在城市近郊發現的寶物被運到城市的市場上，因與那裡的胡人相遇而被出售。即，唐代的異人買寶譚是有關城市中外國商人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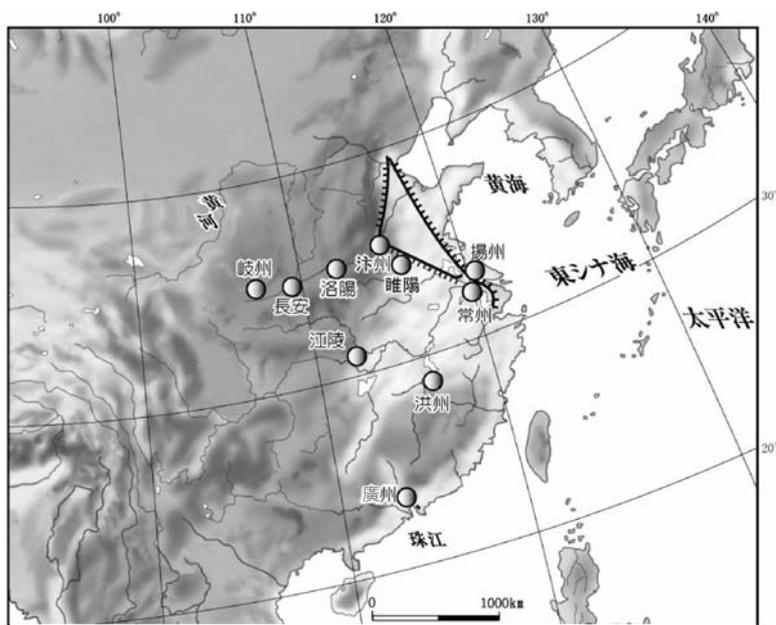
### （四）寶物的外表與真實價值、買賣價格

寶物的外表為石塊、被褥、釘子、土中的劍、嘔吐物等，多為不起眼之物，而另一方面，珠、玉、銅碗與仙人所贈之物等已經具有一定價值者之例也很多。由胡人鑑別出真正價值的寶物之來源可分類為胡人本國與西域的寶物之例（13例）、中國產的寶物之例（8例），以及其他來歷不明的寶物。在寶物的種類中，珠（珍珠）佔大半（19例）。

在弄清金額的25個事例中，買賣價格不足100貫的僅佔4例，其他皆為100貫以上，1萬貫以上者達到11例，甚至有4千萬貫之例。九世紀前半期

28 宋峴，〈唐代揚州的大食商人〉，《中華文史論叢》1987.1: 212-213。

29 在 Schafer, *op. cit.* pp. 413-414. 山田勝芳，前引註6中的論文頁236中，認為胡人買寶譚中的胡人之中，明確種族者幾乎皆為波斯人，是由於他們是胡商之代表。



圖一 唐代異人買寶譚的都市

中央財政的一年預算為 1000 餘萬貫，<sup>30</sup> 因此可知，對於當時的人們而言，作為單獨出售的商品屬於異常昂貴的高價交易。

### (五) 故事的出處

故事的出處，除了不明的數例外，都來自八世紀中葉至十世紀的官僚或知識階層編纂的著作，是以文言寫作的。可以認為是以當時的文言體記錄下來而流傳於記錄者生活的時代中的故事，這在上述（一）時代的設定多數在八世紀前半期以後這一點上反映了出來。

總結上述內容，列舉唐代的異人買寶譚的主要特徵為：1.在時間上，八世紀前半以後廣泛流傳起來；2.主要登場人物為漢人與伊朗、阿拉伯系的外國商人；3.故事的舞臺從長安至南海的商業路線上的各城市；4.寶物的種類為珍珠佔大半；5.故事的出處是根據八世紀中葉以後的官僚、知識分子以文言體記錄、編纂的小說集。

30 日野開三郎，前引註 10 論文，頁 237。

很早就有學者指出，故事中的伊朗系胡人是指來自中亞的粟特人。<sup>31</sup> 從陸路來到中國的外來者，特別是四、五世紀五胡十六國時代以後不斷湧來，到了唐代，尤其是來自中亞的粟特商人在以長安為首的中國諸城市中，為寶石商，經營金融業，具有強大的商業勢力。

實際上，在唐代的異人買寶譚中也存在著姓米的長安的粟特人探知、鑑別寶物的故事，這可以證實中亞的商業居民之活動影響到異人買寶譚之流傳（表中編號 31）。並且以長安為舞臺的異人買寶譚，較多寫明寶物的交易地為西市（表中編號 3、10、15、16），事實上在長安，西市是以粟特人為首的西域商人較多活動的地區。<sup>32</sup>

不過，八世紀中葉以後，由於吐蕃進入中亞與唐朝的軍事力之衰退等，陸路上的往來開始衰退，取而代之的是外國商人通過海路到來者增加。與自古以來就不斷存在陸路交易不同，來自南海的外國人之到來是於伊斯蘭帝國成立後的八世紀以後正式開始的。在廣州、揚州、泉州與交州等中國沿海地區的城市，眾多的穆斯林商人開始集體居住，從唐代至宋代，建立起被稱為「蕃坊」的具有一定治外法權的據點。<sup>33</sup> 穆斯林商人不僅在沿海地區活動，甚至還經過水陸路線，北上抵達國都長安。<sup>34</sup>

在故事中，也有較多直接提及連接中國城市與南海的海上路線者。從海路坐船來到中國的胡人在長安購買寶物（表中編號 4、32），在長安近郊的渭河河畔與長安西方的岐州、大運河沿岸的汴州、廣州等地購得寶物的胡人乘船回到本國，或在海上確認寶物的價值（表中編號 1、7、8、25）。有時開往廣州的船隻上也有胡人乘坐（表中編號 30）。並且有些故事中，寶物的效果為可在水上與海中自由漫步（表中編號 7、8、9、34），以及本國國王在海岸採集珍珠（表中編號 5），這些也體現了胡人與海上航路的關係。

這樣看來，將形成唐代異人買寶譚的重要背景視為在八世紀以後活躍起來的南海貿易中，開始不斷從南海來到中國城市的波斯（伊朗）商人與阿拉伯商人之活動是比較妥當的。如此來考慮的話，以上總結的該故事之特徵，即廣泛流傳於八世紀以後，舞臺為連接長安與南海的商業渠道上的城市，寶

31 Schafer, *op. cit.* p. 413; 山田勝芳, 前引論文, 頁 158-160。

32 妹尾達彦, 〈唐代長安の街西〉, 《史流》25(1984): 20-21。

33 桑原隲藏, 《蒲壽庚の事蹟》(1923年版)(東京: 平凡社東洋文庫, 1989), 頁 78-84。

34 妹尾達彦, 〈唐代長安の官人居住地〉《東洋史研究》55.2(1996): 35-74。

物之大半為珍珠等點都相符合。

原來所謂異人是指共同體的周邊與外部的存在者，是因相對於共同體的關係而變動的概念，不能固定為特定的出身與民族，這已無須贅言。唐代的異人買寶譚中的胡人也不能僅限定為中亞的粟特人、來自南方海上渠道的外國人。不過，不同於自古陸續來自陸路的外國人之遷入，來自海路的伊朗帝國的商人急速進入，使初次與他們相遇的漢人社會的城市居民抱有不少困頓之感，或許我們可以認為這給該故事的形成與傳播帶來了巨大的衝擊力。

一旦發生戰亂，治安混亂時，沿海地區城市中的外國商人往往成為遭受掠奪、殺害之目標的事例不在少數。例如上元元年（760），在安史之亂之時，揚州數千名波斯、大食商人被來自北方的軍隊殺害，<sup>35</sup> 根據波斯灣的港口城市 Siraf 人 Abu Zayd 的記錄，在九世紀末黃巢之亂時，在廣州被殺戮的外國人竟達 12 萬人。<sup>36</sup> 並且，也有記錄說，在安史之亂中，乾元元年（758），大食、波斯國的軍人、民衆襲擊廣州，迫使州的長官逃跑，搶劫倉庫，在居民區縱火，然後向海上逃亡。

這些都是顯示了國家的統制能力削弱時，在胡人與漢人之間發生大規模的殺戮與武力衝突之事例。<sup>37</sup> 從這些事例中可以推測當時的漢人因外國商人擁有巨富而產生羨慕與嫉妒之情，以及對外國人的恐懼與敵視之感。

還有一個故事說，探知了長安太學（國立學校）的窮學生腹中有奇寶的胡人要將此寶物弄到手（表中編號 8）。胡人送給學生金子與絹，試圖接近他，而學生的朋友們說，胡人不惜性命追求利益，僅為了一點米鹽而不惜互相拼殺。怎麼會為了你而白白地浪費金子與絹（一定有什麼陰謀）。勸告他最好躲到城的郊外，於是這個學生躲藏起來。這也適當體現了當時的漢人對於外國商人抱持的普遍之感。

35 《舊唐書》卷 110，〈鄧景山傳〉，頁 3313；同書卷 124，〈田神功傳〉，頁 3532。

36 藤本勝次譯註，《シナ・インド物語》（關西：關西大學出版部，1976），頁 33。原著為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的阿拉伯語文本（抄本編號 2281），藤本譯註根據的是校訂了該抄本的 M. Reinaud, *Relations des voyages faits par les Arabes et les Persans dans l'Inde et la Chine dans le IXes. de l'ere chretinne*, Paris, 1845。關於此見聞錄中所述的，12 萬外國人被殺之人數尚且存疑。參見陳堅紅，〈關於唐代廣州港年外舶數及外商人數之質疑〉，《海交史研究》1987.2: 73-74。

37 《舊唐書》卷 10，肅宗，乾元元年九月條。

中華民國時期，在城市與農村廣泛地以口頭形式傳播的異人買寶譚，可以認為在唐代也在城市居民之間以口頭形式流傳。同樣的情節類型變換了時代、登場人物、舞臺背景而跨越時空傳播正是口頭傳承的重要特徵。據說長安的富家之人從西市的老嫗手中購得舊錦褥，被胡人探知為避暑之寶物「冰蠶絲」而購走之故事（表中編號 10），其後由樂人改編為「得至寶」這一歌舞曲。<sup>38</sup> 這使我們推測在唐代，異人買寶譚不單在口頭傳播，也成為曲藝流傳到各地。

#### 四、世界認識的變遷與異人買寶譚

人間歷史可說是從動植物生息的自然界、神靈存在的超自然界、人間居住的人間世界三個世界難分難解的狀態中，人間世界逐漸獨立，成為世界的主人公的過程。以中國為例，將此變遷進行圖示的話，正如圖一世界認識之變遷於王權、城市。如該圖二所示，人間歷史可說是從動植物的自然界、神靈的超自然界、人間的人間世界難分難解地聯繫在一起的世界中，人間世界逐步獨立出來的過程。可以認為，在世界認識中人間世界獨立出來的過程與胡人買寶譚的誕生，及其後情節類型與結構要素之變形是密接相關的（參看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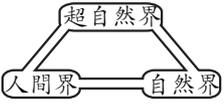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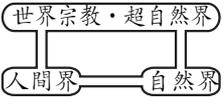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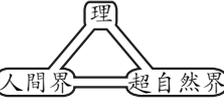
##### （一）人間世界、自然界、超自然界這一認識的形成

人間生活的人間世界這一認識之產生，正是通過人間相對於包圍著人間的、具有絕對威力的自然之存在，開始主張自身之存在而誕生的。改變這一認識的便是城市的建築。因為城市正是人間創造物之象徵。城市啓示人們，人間居住的世界是與自然界獨立而存在的。在中國，到了公元前一千年，在接近遊牧地帶的農業地帶形成了初期的城市網，誕生了區分自然界與人間界的想法。

超自然界這一概念，可以認為是在誕生了包括若干城市在內的國家時孕育出來的。在人間界與自然界之上，還存在著天與神靈居住的超自然界這一想法，也許是促使人間對於自然界的地位相對上昇的人間的一種智略。

---

38 任半塘，《唐戲弄》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頁 772-773。

世界認識的變遷	變遷的概念圖	政治組織的變遷
I 世界的始末		人類的誕生
II 人間界與自然界的創造		集落的形成
III 超自然界的創造—王權理論的成立— 前千年紀—後三世紀：殷、周、秦、漢		都市與國家的形成
IV 世界宗教的征服—王權理論的變容— 四、五世紀—九世紀：五胡十國、南北朝、隋、唐		征服王朝的形成 異人買寶譚的誕生
V 人間主義的進展—「理」的創造 十世紀—十九世紀：宋、元、明、清		國家與社會的世俗化 異人買寶譚的變貌
VI 人間界的獨立 二十世紀：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		近代國民國家的形成 異人盜寶譚的流通

圖二 世界認識的變遷模式圖

隨著超自然界概念之形成，世界各地的古典期國家，試圖通過強調超自然界與人間世界的為政者之間互相溝通這一點，來強化政權之正統性。值此之時，創造出並推翻了王權理論。在中國也是在秦漢古典王朝時期，主張天、地、人相通的思想以天命思想和五德終始說的形式得到系統化，成為其後的王權理論之基礎。西漢時期的長安和東漢的長安之都城結構正是由該思想孕育出來的。

該時期雖然出現了異人買寶譚之萌芽，但異人鑑別埋沒在漢人社會中的寶物並予以購買這一情節類型尚未在民間流傳開來。異人買寶譚在漢人社會中廣泛流傳還需等到四世紀至七世紀歐亞大陸發生巨變。

## (二) 歐亞大陸的巨變與世界認識之變化——胡人買寶譚之誕生

可是，四、五世紀至六、七世紀，由於歐亞大陸游牧民族的移動而帶來的人間集團之大移動，給古典時代的政權以同樣的打擊，迎來了不同種族和出身的人們雜居的時期。該時期正是佛教、伊斯蘭教與基督教等建立在普遍主義思想上的世界宗教在非洲、歐亞大陸廣泛傳播的時期。在既存的人間集團居住地，新的來自外部的衆多人間集團遷移而來，在歐亞大陸誕生了若干

征服王朝。統治這史無前例的錯綜複雜的人間集團的征服王朝，利用普遍主義的世界宗教為國家宗教。同時，世界宗教逐步向一般民衆廣泛浸透。並且，世界宗教之神靈與以往古典王朝時期的神靈相互對立融合，導致了超自然界神靈的變貌。北魏的平城和洛陽、唐初期的長安之城市結構正充分體現了該時期思想之混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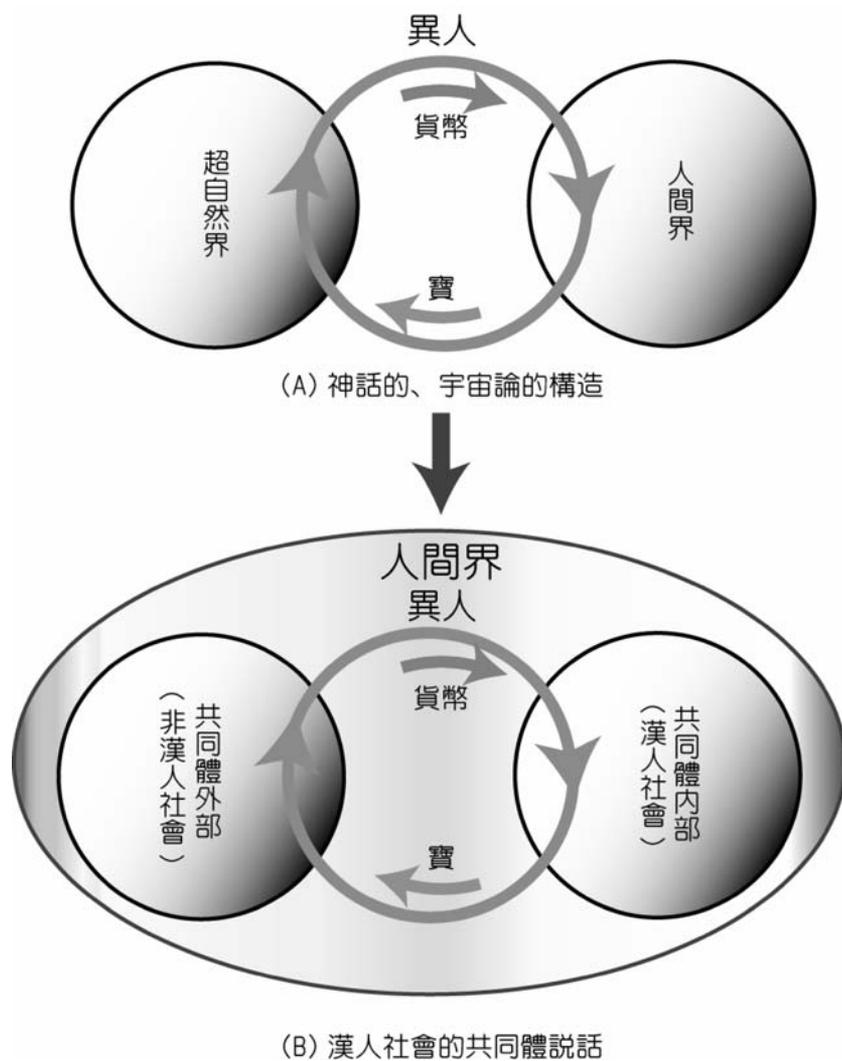
異人買寶譚開始廣泛流傳正是在這一時期。如表中所歸納的，異人買寶譚的主人公多為西域的胡人，是以該時期胡人頻繁來到中國大陸為背景的。該時期的異人買寶譚之情節類型的特色在於，兼有了流浪的主人公通過發現財寶而克服了磨練這一「貴種流離譚」的情節類型。這體現了異人買寶譚儘管是以西域的非漢人商人之實際活動為背景的，但在故事中濃厚地存在著異人構成中介體，來描述神靈世界與人間世界之交流的神話性、宇宙論性結構色彩。

如圖所示，該時期以異人為媒介的財富之交換基本上可以認為具有了溝通人間世界與超自然界的結構。大概這是因為該時期的世界認識是以超自然界與人間世界的關係為軸心而成立的。可是，在十世紀以後的異人買寶譚中，成為人間世界的財富交換之對象的超自然界的比重下降，人間世界的人間之間的財富交換構成主體，人間世界的獨立傾向愈發顯著起來。可以認為這體現了漢人社會的世界認識發生了變化（參看圖三）。

### （三）人間世界獨立與異人買寶譚之變化

在中國，受到佛教的宇宙論之影響，開始了儒教的思想改革，作為人間界、自然界與超自然界之上的概念，新創造出了「理」這一概念。天、皇帝、一般民衆、動植物、自然現象的所有的一切都囊括在理這一大秩序中。這可以認為是思想之世俗化。通過創造出「理」之概念，人間世界得以相對超自然界主張具有相對的優越性，人間世界的獨立之可能性更進一步。宋代的都城開封與臨安正是這一認識開始轉型之舞臺，生活在牆壁消失，開放性的住宅區中的人們之身姿和因商業而熱鬧非凡的街頭景觀中，正銘刻著這一認識之轉型。人間世界驅逐了以往的自然界與超自然界，等同於世界本身，這還有待近代國家之形成。從清末到中華民國，在中國開始了國民—民族國家的建築，人間世界逐步成為世界的主人公。

十世紀以後的異人買寶譚之特點在於，它在居住於中國大陸的人們中樹



圖三 異人買寶譚的變遷——從神話的構造到漢人社會的共同體說話

立「漢人」這一同類意識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漢人」這一同類意識的形成及其變遷在異人買寶譚的情節類型與結構要素之變遷中得到了反映。即四、五世紀至八、九世紀的異人買寶譚的情節類型中遺留著描述神靈世界與人間之交流的神話性、宇宙論性結構，而十世紀以後，變為通過強調共同體外部之存在，來在共同體內部樹立同類意識的情節類型，成為促使漢人社會自我意識到其存在，強化其紐帶的以人間為中心的民間故事。

該趨勢在九世紀流傳的異人買寶譚中已經可以窺視出，在十世紀以後的以回回為主人公的異人買寶譚中更顯著地體現出來，十六、十七世紀以後，隨著西歐人來到中國，西歐人成為異人的主要對象，這一趨勢更加強烈起來。描述二個世界之交換的異人買寶譚的情節類型變化。

敘述向共同體侵犯的異人盜寶譚之情節類型，正象徵著時代之變化。異人買寶譚對來到中國大陸的中國大陸外部之人們賦予「回回」、「洋人」等異人之名稱，通過賦予其鑑別出漢人社會內部的寶物並盜竊的作用，在居住於中國大陸的人們之間樹立了「漢人」這種強烈的同類意識。異人買寶譚中的該變化大約可說是與超自然界喪失威力，人間世界獨立這一世界認識之變化相對應的。

## 五、結語：異人買寶譚與漢人意識的變遷

幾乎收集了所有唐代的異人買寶譚的《太平廣記》全 500 卷，是在北宋的太平興國三年（978）奉皇帝之詔而編纂的，是一部收集了五代十國時代以前的民間說話與小說之類的書。《太平廣記》的各話在從卷 1〈神仙〉以下，從〈女仙〉、〈道術〉、〈方士〉、〈異人〉、〈異僧〉到第 500 卷的〈雜錄〉，是按照反映了當時的道教信仰的分類來整理的。

與這樣的分類法不同，採用類似中國的鍾敬文與西歐的艾伯華所進行的情節類型分析，以及對日本古代故事進行分類的關敬吾《日本昔話集成》與《日本昔話體系》的方法，從《太平廣記》中抽出故事情節展開方式相似的說話，進行重新分類與類型化的嘗試至今還做得不太夠。因石田幹之助先生而開始研究的「胡人買寶譚」型說話為其珍貴的事例。收集情節類型相同的故事，抽出因時空而變化的可變部分，互相對比，尋找出特定的時間與空間中的特徵，這作為今後將說話作為歷史研究之題材的一種方法，今後將會愈

發重要起來。

既然中國的正史與詩文等史料是由官僚記錄、編纂的，它不得不將重點置於皇帝與臣下，政治與個人的關係上。而與此相對，被認為很多是基於口頭傳承的《太平廣記》中所收的各故事，可謂是通過作為記錄者的官僚與知識人之眼來窺視當時民衆心態的極佳史料。從八、九世紀起，經過南海，越過波濤而來的外國商人在各城市與漢人不斷接觸、交流、衝突，同時受到漢人恐懼與款待這一點，通過唐代的異人買寶譚展現了出來。

在本報告中，以異人買寶譚為題材，試圖分析通過創作出對來到中國大陸的中國大陸外部之人們賦予「胡人」、「回回」、「洋人」等異人之名稱，描述探求中國大陸的漢人社會內部的寶物的局外人的故事，在居住於中國大陸的人們之間得以創造出「漢人」這一同類意識的過程。

在四、五世紀歐亞大陸發生巨變，東西交流活躍起來的背景中誕生的異人買寶譚，當初濃厚地遺留著描述人間世界與神靈世界之交流的神話性、宇宙論性結構。可是，由於十世紀以後的中國大陸的內外形勢之變化與世界認識之變遷，異人買寶譚變為通過強調共同體外部之存在，來形成共同體內部的同類意識的，以人間為中心的民間故事。並且，十六、十七世紀以後，在以西歐人為主人公的異人買寶譚中，以往曾存在的描述人間世界與神靈世界之交流的神話性結構消失，轉變為對於傳述異人買寶譚的居民共同生活的共同體進行認同並予以重新建構的故事。

唐代異人買寶譚一覽表

編號	時代	寶物持有者的變化		寶物所在地的轉移		寶物的外表與發現真實價值		出處
		原持有者	寶物購買者	寶物原所在地	寶物交易地點、購入地點	外表(大小)	出售價格「真實價值」	
1	貞元	監察崔向之子崔焯	老胡商	廣州番禺縣墓中	廣州的波斯邸	漢代南越王墓的隨葬品「陽燧珠」	十萬貫「大食國的國寶·陽燧珠」	《太平廣記》卷34，神仙部，崔焯，出自《傳奇》（也收入《才異記》）
2	玄宗	相王時代的睿宗→長安安國寺僧侶	大食國的胡人	長安長樂坊的相王宅→安國寺的常住庫	長安的市	碎石塊（數寸大，傳說價值億萬錢）	億萬錢→四千萬貫「大食國的水珠」	同上卷402，寶部，水珠，出自《紀聞》
3	大曆中	龍神之娘洛陽的劉貫詞（身分不明）	胡客	建於渭河上的渭橋下的龍宮	長安西市	罽賓國的銅碗（普通的黃色銅碗）	二百貫→一百貫「罽賓國的舊寶·鎮國碗」	同上卷421，龍部，劉貫詞，出自《續玄怪錄》
4		馮翊的嚴生（身分不明）	西國的胡商	襄州峴山的山中	長安春明門	珠（類似彈丸）	三百貫「西國至寶·清水珠」	同上卷402，寶部，嚴生，出自《宣室記》
5	安史之亂時	出自名門（勳戚）王友、魏生	胡商三十餘人	虔州的砂州之中	長安的市（推測）	琥珀或石塊（手掌大小）	一千貫→一萬貫「本國寶母」	同上卷403，寶部，雜寶上，魏生，出自《原化記》
6		句容縣的佐史	胡	潤州句容縣的佐史腹中	揚州	嘔吐之物（類似麻鞋底的東西）	一貫→三百貫「本國生病的太子的藥·銷魚精」	同上卷220，醫部，異病，句容佐史，出自《廣異記》
7	武則天時	北周武帝→士人	胡商們	京兆府咸陽縣的寺廟	赴揚州途中的汴州陳留縣邸店	北周武宗的冠珠（歷代不被視為寶物）	一千五百貫→五萬貫「與龍女結合的大寶」	同上卷402，寶部，寶珠，出自《廣異記》
8		長安大學的儒生，陸顯	南越的胡人數人	大學儒生的腹中	長安北方的渭河河畔	腹中的一條蟲（長一寸）	十台車載玉、帛數萬「得海中奇寶之蟲」	同上卷476，昆蟲部，陸顯，出自《宣室記》
9	乾元	洪州的僧侶	波斯胡人	洪州	洪州	小瓶中的東西（珠十二顆）	「紫玳瑁」「火中不燃水中不沉」	同上卷403，寶部，雜寶上，紫玳瑁，出自《廣異記》
10		老嫗→長安的富家之子	波斯人	長安西市的老嫗	長安西市	舊錦褥	價值一萬貫「冰蠶絲」（防暑）	《樂府雜錄》康老子

唐代異人買寶譚一覽表（續）

編號	時代	寶物持有者的變化		寶物所在地的轉移		寶物的外表與發現真實價值		出處
		原持有者	寶物購買者	寶物原所在地	寶物交易地點、購入地點	外表（大小）	出售價格「真實價值」	
11	開元中	玉清宮的仙女科舉進士應考生，韋弁	胡人	成都南郊的玉清宮（仙府）	揚州的市	碧瑤杯、麩枕、紫玉函（玉清宮之寶）	數萬貫 「玉清宮三寶」	《太平廣記》卷33，神仙部，韋弁，出自《神仙感遇》，同上卷403，寶部，雜寶上，玉清三寶，出自《宣室記》
12	開元、天寶	西玉母的第三女→書生，崔某	胡僧	東州邏谷口	東州邏谷口	白玉盒子（仙界的珠寶）	一千貫	同上卷63，女仙部，崔書生，出自《玄怪錄》
13		道士→修行者	波斯	揚州的阿使橋	揚州的波斯店	拄杖	二萬貫 「道士的拄杖」	同上卷17，神仙部，盧李二生，出自《逸史》
14	建中	龍→隱者，任瓊	胡人	光州樂安縣的山中	揚州的市	明珠（直徑一寸）	數千萬貫 「驪龍之玉」	同上卷421，龍部，任瓊，出自《宣室錄》
15	元和中	仙人→接受晉昇考試的官僚，王珣	西域的商胡	洛陽的天津橋	長安的西市（金市）	雞冠之金五十兩左右	二百貫「仙人之寶，難以估價」	同上卷35，神仙部王四郎，出自《集異記》
16	李林甫宰相時	李林甫→長安平康坊菩提寺的僧侶	胡商	長安平康坊李林甫宅→該坊的菩提寺	長安西市	腐朽的釘（長數寸）	一百貫→五百貫→千萬貫「寶物骨」	同上卷403，寶部，寶骨，出自《酉陽雜俎》（續集卷5）
17	開元中	長安至相寺中的蛇→該寺的賢者	胡人	長安的市至相寺佛堂下	長安的市	珠（直徑一寸）	一千貫 「蛇珠」	同上卷457，蛇部，至相寺賢者，出自《廣異記》
18		岑氏（身分不明）	波斯胡人	撫州臨川縣的山谷	洪州予章縣	兩塊白石（大小如蓮心）	三十貫	同上卷404，寶部，岑氏，出自《稽神錄》
19	元和初	鹽船的守船者	胡商	蘇州華亭縣的運河上	揚州的胡店	珠（直徑一寸）	數千貫	同上卷402，寶物部，守船者，出自《原化錄》
20	貞元以後	其後的嶺南從事，盧傳素	胡人將軍	荊州江陵縣	荊州江陵縣的赤坂門	一匹黑駒（其實為盧傳素的表甥）	七十貫	同上卷436，畜獸部，盧從事，出自《河東記》
21		士人	胡人	耕田之中	市（地點不明）	埋在土中的劍	一貫→百貫→十貫 「破山劍」	同上卷232，器玩部，破山劍，出自《廣異記》

唐代異人買寶譚一覽表（續）

編號	時代	寶物持有者的變化		寶物所在地的轉移		寶物的外表與發現真實價值		出處
		原持有者	寶物購買者	寶物原所在地	寶物交易地點、購入地點	外表（大小）	出售價格「真實價值」	
22	武則天時	武則天→長安西明寺的僧侶	胡人（藏於腿肉中）	宮殿→長安的西明寺	長安的西明寺	青泥珠（大小如拇指）	一千貫→一萬貫→十萬貫「西國的青泥珠」	同上卷 402，寶部，青泥珠，出自《廣異記》
23	武則天	象→閩州的莫徠（少數民族）的樵夫	商胡二人	長江沿岸	洪州	象牙	四百萬貫→一千萬貫「本國之寶」	同上卷 441，畜獸部，象，閩州莫徠，出自《廣異記》 *盜寶譚型
24	代宗大曆初	月宮的仙女揚州的好學者，趙旭	胡人	仙界的月宮→揚州的人家	揚州的市	琉璃珠（仙界的珠寶）	一千貫	同上卷 65，女仙部，趙旭，出自《通幽記》
25		旅店主人	波斯胡人（藏於腋下）	岐州扶風縣的旅店門前下	岐州扶風縣的旅館	方石（非發現其中直徑一寸之珠）	二貫「海神尋找的珠寶」	同上卷 402，寶部，徑寸珠，出自《廣異記》
26		洪州人（身分不明）	胡商	洪州人額中*盜寶	洪州的市	額中之珠	被盜後家運衰敗	同上卷 374，靈異部，胡氏子，出自《錄異記》
27		道士（仙人）二人→修行者	胡賈	常州義興縣的洞窟中	常州義興縣的市	青泥（數斗）	「龍食」*僅鑑別	同上卷 424，龍部，張公洞，出自《逸史》
28	寶應二年	仙人→御史、河南道採訪使，唐元瓌	胡商	赴江嶺途中的江西	洛陽	飲器（仙人所贈之物）	「天帝流華寶爵」*僅鑑別	同上卷 27，神仙部，司命君，出自《仙傳拾遺》
29	貞元末年	仙女→士人，李章武	胡僧	華州下邽縣	長安的市的東街	鞞鞞寶物（出自崑崙山仙境）	「寶玉，天上至物」*僅鑑別	同上卷 340，鬼，李章武，出自《李景亮為作傳》
30	乾寧初左右	大尉，徐彥若	胡人	至廣州赴任的海路上的淺灘中	至廣州赴任的海上	琉璃瓶中的小龜（長一寸）	「龜寶」「希世靈物」*僅鑑別	《金華子雜編》卷下
31	建中左右	長安售房的主人	胡人	長安城街西崇賢坊的小宅中	長安城街西崇賢坊的小宅	搗衣砧	子闌玉「奇寶」*僅鑑別	《太平廣記》卷 243，治生部，寶義，出自《乾子》
32		在長安病死的胡人→科舉考生	西域的胡客（病死的胡人之同鄉）	長安的舉人宅隔壁的生病的胡人左	長安的市	珠（彈丸大，胡人的肘中）	五百貫	同上卷 402，寶部，鬻餅胡，出自《原化記》

唐代異人買寶譚一覽表（續）

編號	時代	寶物持有者的變化		寶物所在地的轉移		寶物的外表與發現真實價值		出處
		原持有者	寶物購買者	寶物原所在地	寶物交易地點、購入地點	外表（大小）	出售價格「真實價值」	
33	開元	病死的波斯胡人→汴州浚儀縣尉·李勉	病死的胡人之子	在睢陽旅店病死的波斯胡人胯下	睢陽的埋葬之地	珠（胡人胯下）	價值一千貫的「傳國之寶珠」 *轉讓	同上卷 402，寶部，李勉，出自《集異記》
34		病死的番商（胡商）→進士科應考生·崔樞	汴州的衙役→番人（胡商）贈送	病死在汴州的旅館中的番商	汴州的埋葬之地	珠（價值萬貫）	至寶物「能踏火赴水」 *轉讓	《唐語林》卷 1
35	九世紀初	病死的波斯人→李灌（身分不明）	洪州建昌縣的衙役→外國	病死在建昌縣的波斯人的黑氈中	洪州建昌縣的埋葬之地	珠（直徑一寸，胡人的黑氈中）	外國的寶物 *轉讓	《太平廣記》卷 402，寶部，李灌，出自《獨異志》
36		病死的商胡→兵部員外郎·李約	病死的商胡的親戚	病死在長江船上的商胡	長江流域的埋葬之地	珠（夜光珠）	*轉讓	同上卷 168，氣義，李約，出自《尚書故實》

作者按：本表中的各故事幾乎都在石田幹之助的本文註 1、2 論文，以及日野開三郎的本文註 12、程蕃先生的論著中作為胡人買寶譚曾經介紹過。在本表中，加入編號 13、29、31、34 史料，將異人買寶譚的固定結構要素按照 1.寶物持有者之變化、2.寶物所在地之轉移、3.弄清寶物的外表與真實價值的三項要素，進行還原，列表而成。嘗試通過該表，明確異人買寶譚的固定部分與可變動部分。並且，各故事的排列順序是基於情節類型，不是按照故事所設定的年代順序。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 二、近人論著

（日）小松和彥 1985 《異人論——民俗社會の心性》，東京：青土社。

（日）山本斌 1975 《中國の民間傳承》，東京：太平出版社。

（日）山田勝芳 1985 〈胡人採寶譚をめぐって——中國と日本における異邦人商人と貨幣〉收入高橋富雄編，《文化における受容と變容》，東京：角川書店，頁 155-177。

- (日) 中田薰 1943 〈唐代法に於ける外國人の地位〉，《法制史論集》卷3下，東京：岩波書店，頁1361-1392。
- (日) 日野開三郎 1982 〈唐代の波斯錢について〉，《石田博士頌壽記念東洋史論叢》(1965)，收入《日野開三郎東洋史學論集》第5卷，東京：三一書房，頁231-243。
- (日) 永尾龍造 1941 《支那民俗誌》第2卷，東京：支那民俗誌刊行會。
- (日) 石田幹之助 1967 〈西域の商胡、重價をもって寶物を求める話——唐代シナに公佈せる一種の説話について〉，《民族》4.1(1928): 85-124，收入《長安の春》(增訂)，東京：平凡社，頁210-246。
- (日) 石田幹之助 1967 〈再び胡人採寶譚に就いて〉，《民俗學》5.10(1933): 1-14，收入《長安の春》(增訂)，東京：平凡社，頁247-260。
- (日) 石田幹之助 1967 〈胡人買寶譚補遺〉《日本大學文學部研究年報》6(1955): 67-84，收入《長安の春》(增訂)，東京：平凡社，頁261-281。
- 朱 江 1986 《海上絲綢之路的著名港口——揚州》，北京：海洋出版社。
- (日) 折口信夫 1954 〈國文學の發生〉，《折口信夫全集》第1卷。
- 任半塘 1984 《唐戲弄》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宋 峴 1987 〈唐代揚州的大食商人〉，《中華文史論叢》1987.1: 209-222。
- (日) 桂井和雄 1976 〈遍路や六部などの持ち金を盗んだ家筋の話〉，《季刊民話》7(1976): 241-249。
- (日) 妹尾達彦 1984 〈唐代長安の街西〉，《史流》25(1984): 1-31。
- (日) 妹尾達彦 1987 〈唐代後半期の長安と傳奇小説——《李娃傳》の分析を中心として〉，收入《日野開三郎博士頌壽記念論集》，北京：中國書店，頁476-505。
- (日) 妹尾達彦 1988 〈胡人買寶譚贅說〉，收入《日野開三郎東洋史學論集》第14卷〈編集のしおり〉，東京：三一書房，附冊頁1-6。
- (日) 妹尾達彦 1990 〈唐代長安の店舗立地と街西の致富譚〉，收入《布目潮瀨博士古稀記念論集》，東京：汲古書院，頁191-243。
- (日) 妹尾達彦 1996 〈唐代長安の官人居住地〉，《東洋史研究》55.2(1996): 35-74。
- (日) 桑原隲藏 1989 《蒲壽庚の事蹟》(1923年版)，東京：平凡社東洋文庫。
- 陳堅紅 1987 〈關於唐代廣州港年外舶數及外商人數之質疑〉，《海交史研究》1987.2: 71-74。
- 葉得祿 1947 〈唐代胡商與珠寶〉，《輔仁學誌》15.1、2(1947): 93-118。
- 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 1990 《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 劉勇強 1996 〈掘藏——民俗から小説へ〉，收入《中國——社會と文化》11(1996): 197-223，東京：中國社會文化學會。
- (日) 澤田瑞穂 1983 〈金牛の鎖〉，《天理大學學報》7.9(1972): 1-16；〈異人買寶譚私鈔〉，《早稻田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紀要》26(1981): 133-155，皆收入《金牛の鎖——中國財寶譚》，東京：平凡社。
- 謝海平 1978 《唐代留華外國人生活考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日) 藤本勝次譯註 1976 《シナ・インド物語》（據 M. Reinaud, *Relations des voyages faits par les Arabes et les Persans dans l'Inde et la Chine dans le IXes. de l'ere chretinne*, Paris, 1845），關西：關西大學出版部。
- Peyer, H. C. 著，岩井隆夫譯 1987 〈ヨーロッパ中世における商人の歡待（Kaufmannsgastlichkeit im europaischen Mittelalter）〉，《比較都市史研究》6.1(1987): 13。
- Schafer, Edward H. 1951 "Iranian Merchants in T'ang Dynasty Tales." *Semitic Philology*. Vol. X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 pp. 403-422.

## ***Huren and Hanren: Stories of Strangers Who Bought Hidden Treasures and the Transition of Han Chinese Consciousness***

Seo Tatsuhiko\*

###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resentation is to analyz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a group of folktales in which a foreigner visits a city or village to find and buy an unknown treasure. This type of folktale became widespread in China from the fourth and fifth centuries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this paper, I will interpret the hidden meaning and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folktale. The folktale had a mythological and cosmological structure and functioned as an intermediary between the gods and human beings. However, the folktale began to secularize and the meaning of the story changed after the ninth and tenth centuries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social changes. I will analyze the process and factors of the change in function and structure of the folktale.

**Keywords:** the story of a stranger who bought a hidden treasure, world recognition, Han Chinese consciousness, stranger, foreigner

---

\* Seo Tatsuhiko is a professor in the Faculty of Letters at Chuo University, Japan.